

侗族禁忌文化的生态学解读

闵庆文¹, 张 丹^{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

摘要: 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态知识在当今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所认识, 通过文化多样性保护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我国禁忌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交际中自发地、逐步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 许多禁忌的具体内容与形式会随之发生转化甚至消亡, 但是有些禁忌却仍然在现实生活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许多民族的禁忌习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仍然发挥着其他法律规范、制度措施所不能比拟的积极作用。在大量文献调研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以黔东南侗族地区为例, 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一些禁忌产生的原因, 重点分析了稻作文化中的一些禁忌及其生态学意义, 揭示了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禁忌在内的传统文化对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禁忌; 侗族; 黔东南; 生物多样性保护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8)06-1437-07

1 引言

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紧密关系, 使民族文化在当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中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指出: “(每一缔约国应尽可能并酌情) 依照国家法律立法, 尊重、保护和维持原住和当地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和做法, 并促进其广泛应用”, “保障及鼓励那些按照传统文化惯例而且符合保护或持久利用要求的生物资源习惯使用方式”^[1]。文化多样性还被认为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而更加丰富了生物多样性的内涵^[2]。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在长期与自然适应的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验在各民族传统文化上都有充分的反映, 成为自然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3]。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往往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 各民族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报道, 如传统农业与环境演变的关系^[4]、云南高黎贡山地区传统文化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5~7]、傣族文化与植物多样性的关系^[8~10]、彝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11~13]以及藏族“神山”的生态学意义^[14]等等。

禁忌是一个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交际中, 自发地、逐步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15]。各民族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与民族文化的不同,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禁忌文化。任何一种禁忌的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

收稿日期: 2008-03-18; 修订日期: 2008-09-22

基金项目: 国际合作项目“稻鱼共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与农业部国际合作基金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闵庆文(1963-), 男, 江苏人, 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农业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领域的研究。E-mail: minqw@igsnrr.ac.cn

了该民族现实生活的要求,许多民族的禁忌习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起到了法律规范、制度措施所不能比拟的积极作用。

侗族是东南沿海“干越”的遗裔^[16],后因连年战乱、自然灾害或人地矛盾^[16,17],辗转迁徙至湘、黔、桂边区定居,人口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最为集中^[18],但仍然沿袭着“饭稻羹鱼”的生活习俗与“火耕水耨”、“稻鱼共生”等耕作方式及技术,至今仍有“水稻民族”的称谓和“侗不离鱼”的说法^[19,20]。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尽管已有学者关注侗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及环境保护的关系^[21~23],但系统地探讨禁忌文化的生态学意义则较为鲜见。本文在文献调研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黔东南侗族的禁忌文化的生态学意义,以为民族文化多样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依据。

2 侗族禁忌产生的自然背景

从历史的角度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存环境与禁忌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禁忌;同时,有什么样的禁忌也会影响什么样的自然环境^[24]。作为“水稻民族”和“侗不离鱼”的侗族之所以会形成许多关于稻作文化的禁忌,与其生存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方面密切相关。总体而言,侗族地区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仍较低,稻作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力量还很弱^[25]。影响黔东南稻作生产的主要自然灾害有倒春寒、冰雹、洪涝、伏旱、秋连绵雨、霜冻、凌冻等。

除了自然灾害以外,耕地数量少、质量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2004年,黔东南耕地面积约 $25\,487\times 10^4\text{hm}^2$,其中稻田面积 $16\,9\times 10^4\text{hm}^2$,旱地面积 $8\,6\times 10^4\text{hm}^2$,人均占有耕地 0.041hm^2 ,低于全国(0.1hm^2)和贵州省(0.126hm^2)^[26,27]的平均水平。另外,黔东南山区多,坡度大,水源保证率低,灌溉条件差。据统计,全州大于 25° 的陡坡耕地有 $2\,567\times 10^4\text{hm}^2$,占旱地的29.9%。中低产田比重大,耕地有机质含量小于0.2%的稻田和旱地占耕地面积的6.85%;全氮含量小于1.50‰的稻田和旱地占耕地面积的25.83%;速效磷小于0.1‰的稻田和旱地占耕地总面积的59.47%;速效钾小于10‰的稻田和旱地占耕地总面积的24.17%^[28]。

3 主要侗族禁忌及其成因

祭祀是稻作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29],也是稻作民族重要的生产民俗。稻谷是稻作民族最主要的生活来源,稻谷的丰欠对稻作民族的生存十分关键,因而稻作民族祭祀的核心便是对主宰稻作农业、决定稻谷丰欠的阳光、雨水、土地生产力的祈求。

3.1 日崇拜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卡纳认为:人类的崇拜,最原始的祈求,不外乎是“繁息”,而繁息与太阳是分不开的^[30]。在侗族的传统文化中,日崇拜贯穿始终^[31]。每年农历八月十六的祭天活动非常隆重,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祭日晕。甚至连祭祀中的祭品都与太阳密切相关,如祭品中糍粑形似日晕。侗寨的建筑布局也同样反映了侗族的日崇拜。整个村寨以侗族的标志——鼓楼为中心,其他建筑围绕着鼓楼层层辐射,如太阳的光芒四射。鼓楼前通常都有一个较大的坪,而鼓楼坪中央的图案则多为一个大圆圈,从这个圆圈的圆周一,对称地向四周铺有四根射线,射线与射线之间组成一种放射状的扇形。圆圈、射线、扇形,构成日晕之状,这就是古代侗族崇拜太阳、崇拜天魂创造的日晕图案。此外,在侗寨

鼓楼藻井上也多构造这种日晕状图,甚至在侗族妇女银饰项盘的形象上也很明显^[32]。

蜘蛛在侗语中叫“萨天巴”,而太阳也叫“萨天巴”。侗族人认为天魂在天为日晕,在地时就化为金色大蜘蛛。蜘蛛在侗族人心中地位崇高,崇拜蜘蛛就是崇拜太阳,蜘蛛结网是天魂意志的体现,具有同太阳光芒一样的智慧和力量,可以护佑族人。在侗族地区,蜘蛛还被认为是灵魂物,伤害它们就是伤害魂魄^[32]。侗族人膜拜蜘蛛,并由此产生了不能伤害蜘蛛的禁忌。

水稻生产对阳光、农时的依赖使稻作民族需要观鸟候来把握农时,太阳与鸟合体,有了太阳鸟、金鸡的典型形象^[33]。侗族的原始图腾崇拜其特定的图腾表示中就有仙鹤、金鸡、龙凤等,大量散见于侗家的鼓楼、风雨桥等建筑上。由此产生了禁止伤害鸟及鸟窝,并把爱鸟护鸟的行为规范写入“侗款”^[34]。

3.2 水崇拜

由于水资源对于水稻生产的特殊作用,因此在侗族的乡约民俗中,有许多关于水资源保护的规约,同时各个侗寨水井边均设有祭坛。侗族相信有井神,逢年过节都会祭井;外出的时候,在山区遇到井,需用稻草编的草标祭井。通过这种方式提醒路人:饮水思源,饮水来得不易,要珍惜它,不要污染它^[39]。湖南通道县侗族有“寨田坝水”的宗教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人们用糯米和一些可食的野生植物做成粑粑,祭祀神灵后分食,这种粑粑象征着以黏土和草堵塞田埂和沟渠。人们以此仪式提醒自己,及时修田修沟,以防漏水^[15]。

侗族人民十分珍视水源,对饮用水严加保护,禁忌污染。他们多饮用大树旁的井水或泉水,在井或泉旁建立井亭或泉亭,保护饮用水的清洁。禁忌秽物污染水源,触犯“水神”,井水混浊时,要烧香祷告,祈求井水清澈,才能饮用^[40]。林业生产中,放木排下河滩,忌讳在木排上小便,或把脚悬于水中^[41]。禁忌在井上方建造住房,放养牲畜、家禽等。

3.3 生物崇拜

3.3.1 蛇/龙与青蛙崇拜 东汉《说文》对龙的解释是:“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其中“春分能登天,秋分能潜渊”,反映了龙和农耕的密切关系。春分是水稻和其他作物的播种季节,是最需要水的开始时期;秋分是谷物需要雨水结束的时期。龙被认为是水神,所有水稻民族都对龙进行崇拜^[35]。侗族历来把蛇看成龙的化身,禁忌打蛇。从江县有些地方,看见蛇横卧在路上,还得对蛇祈祷一番,直到蛇走后,才小心翼翼地向前迈步。每年稻谷成熟,收割稻谷或糯禾时,都会祭拜蛇。

青蛙崇拜与龙/蛇崇拜的起因是一样的,也是为了祈雨。侗族有祭雷神的习俗^[36]。在农业实践中,人们观察到,在下雨前夕青蛙的叫声特别大,村民们认为是青蛙的叫声引来雨水。认为青蛙是雷神,能够呼风唤雨,因此禁忌捕食青蛙。在侗族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侗族大歌里,还有专门模仿青蛙鸣叫的歌曲。

3.3.2 鱼崇拜 侗族先民们把鱼当作神物看待,将鱼养在井水中,禁忌捕食。后来随着养鱼经验的积累,采用了稻田养鱼等多种方式,鱼的产量大大提高,人们开始吃鱼。侗族由原来的将鱼看作神进行保护,发展到将鱼当作食物进行大量养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传说侗族在历史上经历了图腾反叛艰苦斗争后,最后形成了崇拜与反叛的统一:既保护鱼也食用鱼,并逐步形成了稻田养鱼^[37]。也有的学者认为侗族人吃图腾物——鱼是一种顺巫术^[38]。

在现在的侗族民俗中,还能看到有关鱼的遗俗。例如,在鼓楼、花桥上都少不了鱼图案的雕刻、塑像和绘画。侗族还为鱼搭建鱼窝,传说侗族的标志建筑鼓楼也因鱼窝启示而建成的^[36]。在稻田里放鱼苗还隐存着一种古老的观念,希望鱼保住粮食。

3 3 3 树崇拜 在侗族地区,侗家人不管是在山坡、路旁还是在寨头屋边,一旦发现如水杉、红豆杉、榉木等珍稀物种,都会打上草标,禁忌破坏。侗族先民对古树充满了敬畏,对杉木(*Cunninghamia lanceolata*)、枫香(*Liquidambar formosana*)、银杏(*Ginkgo biloba*)、榉树(*Zelkova Schneideriana*)、樟树(*Cinnamomum camphora*)等树种禁忌砍伐。人们相信这些古树有灵魂,是树中的权威长者。每逢年节或每月初一、十五都有人到古树下烧香化纸,请求树神保佑。有些人把幼儿过继给古树,请求树神保佑平安^[42]。

3 3 4 森林崇拜 侗族人民通过世代代的观察,已知植物对涵养水源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对水源附近的树木更加注意保护,禁止破坏。他们根据传统的聚落风水观,在村寨周围广植树木,并加以培植保护,其用意在于以这些树木来保住风水。

在林木利用方面,侗族地区有很多的禁忌。为了解决林木利用问题,侗族人民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习俗:在森林之中有意识地开辟少量的林窗,作为“放牛坡”,将牛群限制在“放牛坡”中,避免进入森林,尤其是幼龄期的林地,从而减少因牛的啃食活动造成对森林的破坏^[43];有女儿降生的时候,家人会为女儿种上一片杉木,俗称“十八杉”,等女儿出嫁的时候作为嫁妆^[41];在许多重要仪式中都有植树一项。这些方式,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1]。

侗款中有有关节令的条款,如“向来正月带刀斧上山砍柴,二月斗笠蓑衣,三月用钉耙,四月用犁耙,五月有茄豆、黄瓜,六月禾抽穗,七月莫坐仓恋爱,八月莫留伴玩耍。这些规矩,家家有男要教,养女要训,哪人不听,四村不许,六洞不容。”明确地规定了侗族的生产月令。一、二、三月为林业的操作期,林间的间伐和疏伐安排在一月完成,而林间的中耕安排在二、三月完成,四月以后才开始大田农作。这样的月令安排,除了林间的必要管理期外,一年中绝大多数时间,林区完全处于封闭状态,这样既确保了林区的安全,又有利于大田农业生产的耕作^[44]。

3 4 土地崇拜

侗族对生产能力提高的祈求,主要表现在萨崇拜、祖先崇拜等方面,通过祭祀祈求在她的庇护下得到丰产。

萨崇拜即萨岁崇拜,萨岁又叫萨玛,也叫萨兵、萨滕,意为始祖母,是侗乡南部地区普遍崇拜的女性神,是最高保护神。人们都认为她神通广大,能主宰人间的一切,能影响风雷雨电,能保境安民,使六畜兴旺,村寨平安。祭寨神,可以使山林、水源的生态环境得到良好的保护,使稻作农业生产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由此产生了多种禁忌形式,如在萨坛周围禁忌乱扔东西,禁忌破坏山岭等。有些山岭,特别是侗族村寨后龙山、关山不能动土挖掘,山上的林树、动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谁侵犯了它们,则认为损伤地龙神,破坏风水,认为会给村寨带来灾难。坟场被视为是与祖先直接相关联的宝地,在周围的小环境内禁止各种活动,包括伐木、采集和狩猎。

这些禁忌也写进“款约”之中。侗族传统社会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称为“款”或“侗款”,“款”即侗语“片”、“联盟”之意。每个侗款组织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款首”。通常由款首召集本“款”所属各户户主定期或不定期地聚会,议订有关生产、生活及社会风俗、道德等有关事项。经集体议定的规则,称为“款约”^[45]。如同治八年(1869

年), 贵州省黎平县侗族聚居的潘老乡长春村立下禁碑文载: “吾村后有青龙, 林木葱茏, 四季常青, 乃天工造就之福地也。为子孙福祿, 六畜兴旺, 五谷丰登, 全村聚集于大坪砍生鸡血酒盟誓, 凡我后龙山与笔架山上一草一木, 不得妄砍, 违者, 与血同红, 与酒同尽”^[21]。

4 侗族禁忌的生态学意义

流行于侗族地区的禁忌文化, 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

禁忌伤害蜘蛛, 不仅保护了生物多样性, 而且对农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蜘蛛作为稻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捕食性天敌, 通过织网或游猎捕食活的昆虫(其中大多数为害虫)而不危害农作物, 对人畜极少有危害。利用蜘蛛治虫, 无毒副作用, 蜘蛛本身的生态适应性多种多样, 能捕食多种害虫^[46, 47]。室内实验表明, 草间小黑蛛对飞虱若虫的平均日捕食量为 5.72 只, 拟环纹狼蛛对飞虱若虫的平均日捕食量为 8.08 只, 八斑球腹蛛对飞虱若虫的平均日捕食量为 5.2 头^[48]。田间试验也表明, 蜘蛛对害虫的控制是非常明显的, 30 d 后稻飞虱的数量降低了 20.22 倍, 黑尾叶蝉头数降低了 8.50 倍^[49]。

禁忌捕食蛇, 保护了蛇类这一老鼠天敌的生存。一条中等大小的蛇, 每年可捕鼠 150 只左右。侗家以种植水稻为主, 保护捕食老鼠的蛇类, 其生态意义显而易见。

禁忌捕食青蛙, 有效地保护了青蛙这一害虫的天敌。一只青蛙每天吃掉 70~100 只害虫^[50]。在对青蛙的近亲中华大蟾蜍的研究中发现, 一只大蟾蜍仅在一小时内捕食达 24 次之多。对中华大蟾蜍所捕食物种类的分析, 发现其中有害动物 25 种、1319 只^[51]。

禁忌伤害鸟类, 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控制农林害虫, 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对灰椋鸟食性和食量分析可以看出, 灰椋鸟对降低农林害虫, 特别是对昆虫中直翅目害虫具有重要控制作用。灰椋鸟雏鸟巢期按 18 d 计算, 平均每天每雏喂 16.2 次, 每巢出雏 5.11 只, 一巢雏鸟共喂食害虫 1595.85 只, 按蝗虫: 螽斯: 蝼蛄 = 8: 1: 1 计算, 一巢雏鸟可食蝗虫 1276.7 只、螽斯 159.6 只、蝼蛄 159.6 只, 亲鸟每天自己维持体能也得取食大量的害虫, 其数字相当惊人^[52]。在落叶林挂巢招鸟的试验表明, 森林的有虫株率和平均虫口密度均呈逐年下降, 说明益鸟可以有效地控制森林害虫, 达到有虫不成灾的目的^[53]。

禁忌砍伐古树, 客观上对一些珍贵物种的保护起了积极的作用。禁忌砍伐“风水林”, 则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森林和树木, 提高了森林覆盖率。比如, 从江县的鉴村正是在风水观的支配下还保留有近 10 km² 的原始林区^[54]。

5 讨论

侗族禁忌的产生可能源于侗族先民对自然环境的畏惧, 抑或是对生态环境破坏所引起作物产量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等后果的反思。由于当时不能对这些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因而便将其归因于“神灵”, 希冀通过一定的仪式和禁忌强化人的(生态)价值观, 通过约束人的行为来维持自然生态平衡。

正如其他民族的禁忌一样, 侗族禁忌中也有虚妄、不科学的成分, 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禁锢作用, 限制了社会的进步。但我们必须看到, 在众多的禁忌文化中, 有一些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 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需要我们给予科学的解释, 并让这些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我们需要

泼出去的是脏水,但我们时常是连孩子一起泼掉了;我们研究包括禁忌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目的正是把随着脏水泼出去的孩子再抱回家里。

参考文献:

- [1] 《生物多样性》编辑部.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生物多样性, 1995, 3(1): 53~ 57.
- [2] Dasmann R F.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Oldfield M. and Alcorn J. (eds). Biodiversity: 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Eco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Boulder, San Francisco, Oxford, 1995 9~ 15
- [3] 李文华, 闵庆文, 孙业红. 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地理研究, 2006, 25(4): 561~ 569
- [4] 连鹏灵, 方修琦. 岱海地区原始农业文化的兴衰与环境演变的关系. 地理研究, 2001, 20(5): 623~ 628
- [5] 刀志灵, 龙春林, 刘怡涛. 云南高黎贡山怒族对植物传统利用的初步研究. 生物多样性, 2003, 11(3): 231~ 239
- [6] 艾怀森. 高黎贡山地区的傈僳族狩猎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1999, 11(1): 75~ 80
- [7] 艾怀森, 周鸿. 云南高黎贡山神山森林及其在自然保护中的作用. 生态学杂志, 2003, 22(2): 92~ 96
- [8] 许再富, 刘宏茂. 西双版纳傣族贝叶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 1995, 3(3): 174~ 179
- [9] 刘宏茂, 许再富, 陶国达. 西双版纳傣族“龙山”的生态学意义. 生态学杂志, 1992, 11(2): 41~ 43
- [10] 刘宏茂, 许再富, 段其武, 等. 运用傣族的传统信仰保护西双版纳植物多样性的探讨. 广西植物, 2001, 21(2): 173~ 176
- [11] 龙春林, 张方玉, 裴盛基, 等. 云南紫溪山彝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 1999, 7(3): 245~ 249
- [12] 刘爱忠, 裴盛基, 陈三阳. 云南楚雄彝族的“神树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应用生态学报, 2000a, 11(4): 489~ 492
- [13] 刘爱忠, 裴盛基, 陈三阳. 云南楚雄彝族植物崇拜的调查研究. 生物多样性, 2000b, 8(1): 130~ 136
- [14] 邹莉, 谢宗强, 欧晓昆. 云南省香格里拉大峡谷藏族神山在自然保护中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 2005, 13(1): 51~ 57
- [15] 白兴发. 论少数民族禁忌文化与自然生态保护的关系.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28(4): 62~ 65
- [16] 张民. 试探侗族形成. 贵州民族研究, 1994, (2): 95~ 104
- [17] 吴廷栋. 侗族是百越一支发展起来的土著民族. 贵州民族研究, 1993, (2): 66~ 74
- [18] 石开忠. 新中国成立后五次人口普查侗族人口的发展.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5): 100~ 104
- [19] 冯祖贻, 等. 侗族文化研究.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 [20] 刘芝岚. 中国侗族民俗与稻作文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21] 杨昌岩, 裴朝锡, 龙春林. 侗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关系初识. 生物多样性, 1995, 3(1): 44~ 45
- [22] 杨昌岩, 曲亮成, 扬华枝. 侗乡民俗与自然保护. 植物杂志, 1996, (2): 7~ 8
- [23] 何丽芳, 黎玉才. 侗族传统文化的环境价值观. 湖南林业科技, 2004, 31(4): 58~ 59
- [24] 李本书, 王海峰. 现代生存论语境下民族禁忌的生态伦理价值. 伦理学研究, 2005, (6): 72~ 75.
- [25]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业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12~ 13
- [26] 国家统计局. 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 [27] 贵州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 2005 年贵州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 [28] 廖臻瑞, 王月琴, 刘文锋. 贵州省黔东南州耕地资源状况和可持续利用对策. 农业技术经济, 1999, (5): 53~ 56
- [29] 董绍玉. 云南稻作民族文化生态. 经济地理, 2002, 22(1): 92~ 96
- [30] 卡纳(英). 人类的性崇拜. 海口: 海南人民出版社, 1988 28
- [31] 朱吉英. 侗族传统文化中的日崇拜. 民族论坛, 2006, (2): 42~ 43
- [32] 杨保愿. 侗族蜘蛛崇拜文化. 民族艺术, 1997, (2): 41~ 50
- [33] 胡立耕, 李子贤. 中国稻作文化研究的进展与前瞻(下). 楚雄师专学报, 2001, 16(2): 36~ 43
- [34] 吴景军. 爱鸟护鸟的民族——侗族. 民俗研究, 2000, (1): 137~ 139
- [35] 游修龄. 龙和稻文化. 中国稻米, 1994, (2): 35~ 38
- [36] 李子贤, 胡立耕. 西南少数民族的稻作文化与稻作神化. 楚雄师专学报, 2000, 15(1): 65~ 76.
- [37] 吴佳新. 从民俗学角度看侗族渔业. 农业考古, 1988, (2): 278~ 281
- [38] 陈维刚. 广西侗族的鱼图腾崇拜. 广西民族研究, 1990, (4): 60~ 62
- [39] 郑阿财. 从越南北宁“祭井”论民俗中的水资源文化.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41(4): 60~ 65
- [40] 贵州省天柱县志编纂委员会. 天柱县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 121~ 122
- [41] 杨玉林. 侗乡风情.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5 271~ 274

- [4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267
- [43]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编写组编.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8 145~ 147.
- [44] 潘盛之. 论侗族传统文化与侗族人工林业的形成.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1): 9~ 14
- [45] 古开弼. 我国历代保护自然生态与资源的民间规约及其形成机制.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1): 40~ 48
- [46] 胡金林. 中国农林蜘蛛.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1~ 482
- [47] 吴进才. 稻田三种捕食性天敌与两种害虫共存系统捕食量的研究. 生态学报, 1991, 10(3): 10~ 14
- [48] 汪华. 稻田蜘蛛种群动态及保护研究. 现代农业科技, 2007, (10): 58~ 59
- [49] 王智, 宋大祥, 朱明生. 低剂量农药对稻田蜘蛛生态位及控虫效能的影响. 河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 26(3): 278~ 282
- [50] 刘元复. 农田的忠诚卫士——青蛙.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1986, (5): 46~ 47
- [51] 辜永河, 聂捷夫. 贵阳地区菜地内中华大蟾蜍食性分析及捕食观察. 动物学杂志, 1985, (2): 9~ 12
- [52] 姚玉领, 张长普, 孔德琦, 等. 灰椋鸟繁殖习性及其对害虫的控制作用研究. 山东林业科技, 2006, (3): 46~ 48
- [53] 张文丽, 王佰彦, 张永海. 益鸟招引对森林害虫的控制. 黑龙江环境通报, 2005, 29(1): 20~ 21.
- [54] 石开忠. 侗族传统聚落观念与环境的交融. 思想战线, 1998, (11): 61~ 65

Ecological connotation of some Dong Minority's taboos

MIN Qing-wen¹, ZHANG Dan^{1,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naturel management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to conserve cultural diversity has been taken as one of the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hina is a typical nation with multiple minorities and plentiful minority cultures which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so-calle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boo, one of the most disputed and complex socio-cultural phenomena, was formed during the long historical natural adaptation and social intercommunication. Although most taboos have been changing or even disappeared along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odern times. More importantly, compared to laws, rules or legislations, some taboos are more easily accepted by local people in some area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view of many kinds of literatures and field survey in Dong Minority located in Congjiang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background of taboo formation was analyzed, some typical taboos related to rice-planting such as god and ghost worship, ancestor worship, and water worship, fish worship, frog worship, snake worship and so o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were discussed from the ecological angle, an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including taboo i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illustrated.

Key words: taboos; Dong nationality; southeast Guizhou; ecological conservation